

比较

NO.2, 2012

59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刘鹤

对过去的归纳和对未来趋势的展望

蔡昉

如何认识中国收入分配现实

加里·汉森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从马尔萨斯到索洛

雅诺什·科尔奈

集权化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巴里·埃肯格林 朴东炫 申宽浩

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何时减速

丹尼·罗德里克

经济趋同的未来

宣昌能 陶玲

国际金融危机中全球主要央行的角色转变

约翰·阿穆尔 科林·梅耶 安德烈亚·波洛

金融市场的监管处罚和声誉损失

白南风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状态及评价

比较

No.2, 2012

59

C O M P A R A T I V E S T U D I E S

吴敬琏 主编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主管 中信集团

主办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主编 吴敬琏

副主编 肖梦 吴素萍

编辑部主任 孟凡玲

编辑 包敏丹

封面设计 李晓军 / 美编 杨爱华

经营部

总经理 吴传晖 (兼)

总经理助理 黄易

商务拓展总监 王正

华北销售总监 宋洋 / 客户总监 胡蓉 田野

华东销售总监 王海瑾

华南客户总监 苏丽衡

市场总监 金楠

发行总监 邱道姗

整合营销总监 周轶

设计总监 石乐凯

品牌传播总监 马玲

独家代理：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8610) 85905000 传真：(8610) 85905288

广告热线：(8610) 85905088 85905099 传真：(8610) 85905101

电邮：ad@caixinmedia.com

订阅及客服热线：400-696-0110 (8610) 58103380 传真：(8610) 85905190

香港地区订阅热线：(00852) 21726522

订阅电邮：circ@caixinmedia.com 客服电邮：service@caixinmedia.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号温特莱中心A座16层 (邮编：100026)

卷首语

当前，求变中国的呼声空前高涨，压力迫在眉睫，但对变革的方向或目标却与 90 年代不同，缺乏共识，充满焦虑和烦躁。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之源是什么？“改革是资源配置制度的整体跃迁”这一原本清楚的认识，现在也因经济和社会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以及美国发端的金融危机夹击，反而陷入纷扰和混沌的泥潭。幸而，刚刚结束的两会表明，高层对改革的大趋势已确定，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刻不容缓。改革开放是实现经济转型和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我们将深化财税、金融、价格、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所突破，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坚决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本辑《比较》围绕“政府与市场”、“增长或停滞”这些经济学关注的主题展开讨论。

《对过去的归纳和对未来趋势的展望》是刘鹤在“2012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他从历史、时代背景、制度安排、政府定位以及改革路径五个方面，简要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以及概括了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和市场化仍将是主要特点。对于未来的经济改革，他认为，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观念，即产权保护、鼓励竞争、公平与效率统一、共同富裕。并且要有针对性地和有先后顺序地解决一些突出的体制矛盾和问题。

蔡昉的《如何认识中国收入分配现实》一文，概括与库兹涅茨式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若干新事实，综述和评说关于中国收入分配趋势的不同判断，解释收入分配现状，提出如何为库兹涅茨转折点创造条件的政策建议。对招致人们痛恨的“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等收入分配现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判断。比如，其中有一项政策含义指出“如果不能揭示导致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资源和资产的分配不公，就可能把政策引向工资均等化的轨道上，过度依仗在劳动报酬为主的常规收入上的再分配，而并不能触动不合理地大规模占有资源的群体，反而伤害中等收入者。”

《集权化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雅诺什·科尔奈讨论匈牙利时局的文章。他用33个案例和六个方面的变化,描述了匈牙利自青民盟执政两年来的集权化趋势,进而比较了“集权化”和“分权化”的规范分析。用八个标准:短期效率、竞争、适应和选择、信息、独立自主和自治的价值、父爱主义和自我负责、多样性、政治标准,批判和分析了集权化的后果。科尔奈痛苦地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第一本著作的主题《过度集权化》几十年后会再度成为(匈牙利)时下的话题。”他指出,政府与市场是不同类型的组织协调机制,它们的和谐相处并不容易。匈牙利政府反复无常和难以预测的经济政策,法治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市场经济规则的反复破坏,打击了商业界的信心,导致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深受影响。

“前沿”栏目是诺奖得主普雷斯科特和汉森的文章《从马尔萨斯到索洛》。文章提出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工业革命的爆发,即从人均收入停滞不前到其不断增长的转变。作者建立的模型结合了现代索洛增长模型和马尔萨斯的观点:前者描述了现代工业化经济体的特质,而后者为解释1800年前的经济增长提供了研究框架。该新模型在标准的一般均衡增长模型中引入两项新的技术变量。两种技术“马尔萨斯技术”和“索洛技术”都用来生产同一种产品,两者的全要素生产率皆为外生性增长。

埃肯格林等人的文章利用始于1957年的国际数据,构建了一组增长迅速的经济体在何时经历增长减速的样本点。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以2005年不变国际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约为17 000美元时,迅速增长经济体增长显著减速,即增长率下降超过2%,而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将在2015年或稍迟一点达到这一水平。从就业率(制造业就业率占23%)以及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后发国家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58%)来看,中国也都将达到增长减速的临界点。作者也指出,人均收入同增长减速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快速增长能维持多久,还取决于经济政策,如开放、更灵活的汇率政策、提高消费等都有助于维持快速的经济增长。

罗德里克《经济趋同的未来》一文,探讨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差异能否持续,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近来经历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他认为,有关增长的实证文献证明,趋同并非是自发的。它需要特定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然而这些政策和制度难以识别和实施,而且还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要的是看能否快速地实现经济的结构转变,将经济资源导入那些“趋同产业,比如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发展中国家持续的快速增长需要积极的政策,以推动结构转型并催生新产业,一如发达经济体在迈向富裕之路时所采取的政策。

“政策评论”栏目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宣昌能和陶玲的文章。他们讨论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全球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如何从最后贷款人角色转变为最后券商的角色,并对缓解金融风险、提振市场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作者也指出,中央银行作为“最后券商”的非常规措施应该是暂时的,一旦

上述危机因素消除，就应逐渐退出，对因危机救助形成的资产负债表损害应通过成本分担机制逐步修复，并重新回归“最后贷款人”角色。

金融监管机构针对某公司不当行为的处罚会不会引发声誉损失，目前学术界意见不一。“法和经济学”栏目中约翰·阿穆尔等人的文章认为，之所以意见不一，是因为当前针对声誉损失的分析受到了不少混杂因素的影响，很难分清声誉损失的影响。而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在监管执法过程中，只有当发现公司违规并招致经济处罚整个过程完成时，才会一并公之于众，不会受到其他信息的干扰。通过对这些公告披露对公司股价影响的分析，作者认为，声誉损失确切存在且约为经济处罚的9倍之多，但又不至于影响公司的偿付能力。因而，声誉惩罚也可以为监管执法的重要形式。

《比较》第48辑发表了王小鲁有关灰色收入的第二篇研究论文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引发了不少的争论，我们也陆续刊登了有关争论文章和王小鲁本人的回应文章。本辑《比较》中李实等人的文章再次对王小鲁的研究方法和估算结果提出了质疑，并针对王小鲁对他们的估算结果所作的批评，给出了回应。

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居民究竟对生活其中的城市有何看法，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了解这些问题，对推动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管理决策都有重要意义。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白南风等在2011年对北京和深圳两个城市进行了试点调查，调查内容涵盖收入、居住、就业和创业、个人发展机会、生活消费和服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交通、环境、社会治安、社会公平、社会信任和尊重、政府管理及公共服务、城市生活压力、城市归属感等16个方面。文章归纳和总结了调查的结果，为我们了解北京和深圳两大城市的居民生活状态和居民对城市生活的感受与评价，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借鉴。

目 录

Contents

第五十九辑

- 1 对过去的归纳和对未来趋势的展望 刘鹤
The Reasons for China's Success and the Prospects of Future
Developments *by He Liu*
- 5 如何认识中国收分配现实：一个求同存异的分析框架 蔡昉
How to Underst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Seeking Common
Ground from the Debates *by Fang Cai*

前沿

Guide

- 26 从马尔萨斯到索洛 加里·汉森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Malthus to Solow *by Gary D. Hansen Edward C. Prescott*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44 集权化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雅诺什·科尔奈

Centralization and the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by János Kornai

海外特稿

Special Feature

68 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何时减速：国际证据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巴里·埃肯格林 朴东炫 申宽浩

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by Barry Eichengreen, Donghyun Park and Kwanho Shin

110 经济趋同的未来

丹尼·罗德里克

The Future of Economic Convergence

by Dani Rodrik

政策评论

Policy Review

138 从最后贷款人到最后券商：国际金融危机中全球主要中央银行的角色转变

宣昌能 陶玲

From Lender of Last Resort to Dealer of Last Resort—Metamorphosis of Central Bank's Role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y Changneng Xuan and Ling Tao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152 金融市场的监管处罚和声誉损失

约翰·阿穆尔 科林·梅耶 安德烈亚·波洛

Regulatory Sanctions and Reputational Damage in Financial

Markets

by John Armour, Colin Mayer and Andrea Polo

争鸣

Debates

176 再评王小鲁的灰色收入估算

罗楚亮 岳希明 李实

More Comments on Estimation of Grey Income by Wang Xiaolu

by Chuliang Luo, Ximing Yue and Shi Li

改革论坛

Reform Forum

192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状态及评价

白南风

Survey and Evaluation of Residents' Living Conditions

by Nanfeng Bai

对过去的归纳和对未来趋势的展望

刘 鹤

本文拟就两个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一是过去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原因。二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过去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实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总体跃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也创造了不少新的经验，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的成功做法都极为关注。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功？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结果？国际和国内学界对此作过不少研究。在诸多解释中，我认为有几个因素可能值得高度重视^①。一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发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对文化革命负面作用的反思和从中得到的教训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正是因为发生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浩劫，正是因为在这期间大量生命换来的血的教训，也正是因为当时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的痛苦记忆，使中国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在邓小平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二是从时代背景看，中国坚定不

* 本文是作者在2012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其中有个别文字性修改。

① 参见刘鹤《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2008年刊于《50人看30年》，第263页。

移地推行的对外开放发生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之后，这恰恰赶上了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后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的历史机遇，在劳动力资源丰富、人民群众希望通过奋斗改善生活状况的要求非常强烈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获得了稀缺的资本和最新的技术，迅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并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三是从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看，中国的发展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虽然改革初期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辩论，但实际改革的成功试点恰恰遵循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律，这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主要包括：界定和保护相对产权，承认和激励人的物质利益动机，由市场主体根据价格信号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在越来越多的产业推动公平竞争和实现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四是正确发挥政府应当发挥的作用。我们一直认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是互补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上和商业周期的不同阶段，两者的互补形式又有很大的区别。总的来看，中央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引导结构变化方向上一直起到重要作用，但又逐步减少对经济活动的不必要直接干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和效益注入大量精力，由此形成的地方经济竞争也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对这个问题需要客观和一分为二地加以认识。五是选择了有中国特色的改革路径。在保持社会政治制度稳定前提下，中国的改革始终注意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基层积极性的有机结合，改革总体有序和可控，而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休克疗法。以上几条并不是理论的抽象，而是在实践中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我注意到，有些学者根据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把中国的成功归纳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也容易产生误导。在我以上描述的几条中，我们很难看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子。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当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我们的确不得不进行了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也遗留了一些问题，这些只是应对危机的短期做法，并不能反映 30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实践。

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总的来看，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最鲜明的特点，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快转型，国民经济将由出口导向、制造业为主和粗放投资的增长模式向内

需消费为主、服务业份额上升和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模式转化，我们称之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转型过程中，前 30 年出现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趋势将会出现新的特点，经济增长有可能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平稳较快增长转变。

首先是工业化趋势将会出现新特点。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市场条件明显变化，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全面加快，庞大的制造业受土地、水、能源和空气质量等资源环境因素的约束也日益强烈，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空间和弹性加大。展望未来，工业化的主要特点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可能下降，服务业的比重将有较大提升。在制造业内部，将会出现以生产集中和专业分工深化为特征的供应链结构调整，基于知识技能积累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生产方式将逐步发挥重要作用，绿色低碳的增长方式将受到鼓励，新型产业将加快发展，满足内需的生产能力会有更大增长空间。

城市化趋势仍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到 2011 年，城市人口达到 6.8 亿左右，比重从 1978 年的 19% 上升为 50.5%，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但与发达国家 75% ~ 80% 的城市化率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员推测，到 2020 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可能达到 60% 左右，到 2030 年可能达到 65% 以上，这个过程的延续将释放出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城市化格局和形态将出现新的变化，最主要的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将会形成新的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的经济分工和城市群发展的趋势也将十分明显。随着城市人口逐步增加、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中的独生子女比重上升和农业人口市民化，中国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也会大幅提升，规模巨大的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出现和形成的消费需求，将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乃至扩大全球市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将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但国际化的内容也会发生较大变化，最主要的线索是国际收支将逐步走向平衡，而这将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变化相互适应。一方面，中国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保持出口大国地位，但与此同时，它将根据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新定位，实现从出口和引资大国向市场大国和投资大国的角色转化，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均衡发展，而且将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再平衡作出重要的贡献。在中国经济国际化过程中，我们将承担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推动国际秩序向更

加公平的方向发展。

中国市场化进程将继续加快，未来的改革应当按照价值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深化。所谓价值导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观念，坚持产权保护，坚持鼓励竞争，坚持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谓问题导向，就是要有针对性地和有先后顺序地解决一些突出的体制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财税、价格、金融、企业分配制度和政府职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必须加快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努力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有效制约公共权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从而使经济转型顺利推进。

在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信息技术的渗透、应用和扩散将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海量数据处理能力的提高，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和移动通讯技术发展，将使很多用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有可能通过技术手段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但与此同时，信息化也给中国和世界提出了很多需要深入研究和应对的新课题。

毫无疑问，在中国这个巨大规模的经济体转型过程中，我们将遇到许多前人没有遇到过的风险、困难和挑战，但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转型以及在转型过程中延续的大趋势，将为中国和世界创造出巨大的需求潜力和庞大的市场空间，从而保障中国经济的持久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有什么改变，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如何认识中国收入分配现实

一个求同存异的分析框架

蔡 昉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论语》

人们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和关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与之相关的收入分配问题上。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高速增长一旦减速甚或停滞，收入增长也相应地减慢或者陷入徘徊。与此同时，没有经验证据表明，在中等收入阶段上，在经济增长停顿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状况可以得到改善。相反的情形是，在经济增长及至收入增长停滞的条件下，收入差距往往进一步恶化。其二，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收入差距扩大，如果严重性达到了某种限度且没有有效政策手段予以制止，则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凝聚力降低，继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以及减速乃至停滞的原因。

随着中国到达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收入分配状况的改进越来越成为紧迫的任务，也是大多数居民对政策的殷切期待。同时，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际，相比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改善收入分配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条件，理论上可以期待一个收入差距从峰顶上开始下降的库兹涅茨转折点。不过，收入差距缩小的转折点不会自动到来。本文概括库兹涅茨式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

配关系的若干新事实，综述和评说关于中国收入分配趋势的不同判断，解释收入分配现状，提出如何为库兹涅茨转折点创造条件的政策建议。

一、新库兹涅茨事实

库兹涅茨在其著名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等》一文中，着重于回答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增长进程中收入分配不均等状况是恶化还是缓解，以及哪些因素决定其长期水平和趋势^①。换句话说，库兹涅茨事实是关于收入差距随经济发展水平先扩大然后缩小这一趋势的观察、解释和经验检验。库兹涅茨本人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少数发达国家经验的不完整数据，后来的研究已经在其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展。总体而言，从库兹涅茨假说的扩展和检验文献，以及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状况的新事实的观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库兹涅茨事实的基础上，影响收入分配变化方向的因素多种多样，并且依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发展阶段、政策取向不同，可能发挥主导作用的因素也不尽相同。

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特别是与验证库兹涅茨假说相关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被总结为诸多特征化事实^②。但是，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过分拘泥于对倒 U 型曲线的检验，许多研究者忽略了库兹涅茨假说背后的至今仍然颇有价值的思想、分析角度和分析逻辑。至于从更深层面出发，结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特点，全面评说收入分配现状和趋势，及至提出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促成库兹涅茨转折点，更是迫切呼唤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理解。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倘若应用库兹涅茨的分析框架，或者以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先扩大后缩小，呈倒 U 型变化轨迹的假说为基准，就需要从二元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出发，回答哪些因素可以打破储蓄或资产积累造成的马太效应，以及城乡人口相对份额的变化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收入分配变化趋势。换句话说，观察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应该遵循一个主线，即

① Simon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 1955, pp. 1-28.

② 直接使用“特征化事实”这个术语的文献如 Montek S. Ahluwalia,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Some Stylized Facts*, *Income Distrib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66, No. 2, May 1976, pp. 128-135.

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相关的基本市场力量。要想理解如何创造条件迎来中国的库兹涅茨转折点，须从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出发，在更加广阔的层面着眼。下面，我们以分析中国问题为出发点，根据自身分析的需要，归纳若干新库兹涅茨事实，主要是指与库兹涅茨事实有关的，特别是近年来与解释和检验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有关的研究结论。特别要指出的是，本文力图选择和概括那些对中国收入分配现实及其判断有密切针对性的研究结果，因此，在作归纳时，难免挂一漏万。

关于库兹涅茨转折点的第一个新事实是，该转折点与刘易斯转折点在发展阶段上的重合。库兹涅茨猜想到，与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潮之后一系列力量相关的因素，都可能有利于改善城市低收入人群（如落户的进城移民）的相对收入状况。而他所描述的这种发展阶段，其实就是剩余劳动力显著减少，从而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上涨的刘易斯转折点^①。南亮进等人的研究发现，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可以解释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长期趋势以及高速增长^②。与此相应的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扩大。按照逻辑，当日本迎来其刘易斯转折点时，熟练劳动者与非熟练劳动者之间的工资趋同等现象必然伴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趋势^③。此外，也有研究表明，虽然日本收入集中度的大幅度下降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是，战后特别是当日本于 1960 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收入集中度的下降趋势与经济发展阶段的逻辑更加相符^④。

与库兹涅茨假说相关的第二个新事实是，收入分配改善抑或恶化与政府意愿和政策以及相关制度安排密切相关。在解释如何消除储蓄集中对高收入群体

①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库兹涅茨的分析是建立在二元经济发展框架基础上的。有关综述可参见 Joseph Deutsch and Jacques Silber, *The Kuznets Curve and the Impact of Various Income Sources on the Link Between In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s No. 2001-03,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Bar-Ilan University, 2001.

② Ryoshin Minami and Akira Ono, Behavior of Income Shares in a Labor Surplus Economy: Japan's Experi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29, No. 2, 1981, pp. 309-324.

③ Ryoshin Minami,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in the Project of Institute of Asian Cultures Toyo University "The Discussion on the Changes in East Asia Labor Market Based on Lewisian Turning Point Theory", Tokyo, 18th - 19th, July 2010.

④ Chiaki Moriguchi and Emmanuel Saez, The Evolution of Income Concentration in Japan, 1886-2005: Evidence from Income Tax Statistic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90, No. 4, 2009, pp. 713-734.

收入份额的累积效应时,库兹涅茨指出了法律干预和政治决策的作用。大量新事实也表明,收入分配问题并不是自由劳动力市场的自然结果,而受到政策和制度的影响。克鲁格曼回顾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交替执政过程中,对待收入分配的不同政策倾向与实际不平等程度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政策,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政策产生的收入分配结果影响十分显著^①。

虽然围绕劳动力市场制度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在这个领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这类制度安排是否会削弱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激励机制上面,而对于劳动力市场制度与收入分配状况的关系,学界则有着更多的共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做的经验研究都表明,比较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确具有显著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②。

与库兹涅茨假说有关的第三个新事实是,收入分配状况受到产业和技术结构特征及其变化的影响。库兹涅茨本人指出,技术进步引起的产业机会或者服务业发展都使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成为可能,他把这种可能性作为倒U型曲线的辅助论据。在科技发展迅速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多的观察和证明丰富了这方面的证据库。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考文指出,由于技术进步速度下降,并且新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具有获取公共资源,投资于仅仅使少数人获益的“私人产品”领域的性质,因而无助于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③。类似的情况,如资产收入占主导的产业结构,不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

萨缪尔森证明,全球化并不必然使加深贸易的各国均等地获益。既然在一个国家内,劳动力不是同质的,那些低技能或受教育水平不足以按照国际分工要求与时俱进地更新技能的群体,可能因全球化而成为受损者^④。这无疑与人力资本的积累特点直接相关,即一些劳动者群体的技能不能与全球化带来的国

①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信出版社,2008年。

② R. Freeman, 'Labour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chapter 34 of P. Blyton et al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8; R. Freeman, 'Labour regulations, unions,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rket distortions or efficient institutions?', in D. Rodrik and M. Rosenzweig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 Amsterdam: Elsevier.

③ Tyler Cowen, *The Great Stagnation: How America Ate All the Low - Hanging Fruit of Modern History, Got Sick, and Will (Eventually) Feel Better*, New York: Dutton, pp. 20 - 22.

④ Paul Samuelson,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8, No. 3, 2004, pp. 135 - 146.